



40年“申遗路”，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中国智慧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文化中国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2025年，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

1987年，长城、北京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成为首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今年7月11日，西夏陵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40年时间，中国走过的这条“申遗路”，既是对历史遗产的守护，也是对未来的责任担当。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

“中国的世界遗产讲述了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的故事。中国的世界遗产及预备名录上的项目共同展现了一条跨越时空的历史轴线。”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表示。

近日出版的《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按照时间顺序，选取11处极具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勾勒出一条跨越千山万水的申遗之路，也展示了中国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的独特智慧。

从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到充满诗意图境的苏州园林，再到洋溢着多元文化氛围的鼓浪屿……书中对这些遗产地的描述，串起了中华文明数千年不曾中断的精神脉络，勾勒出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宏大史诗。

中华文明的基因，在遗产中一直“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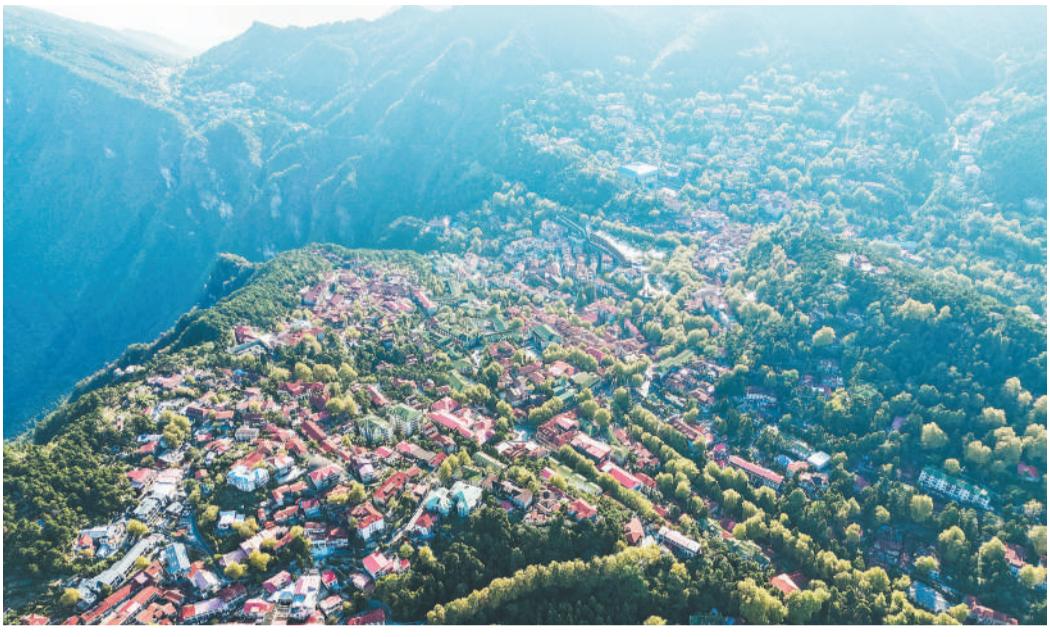
既要保护文化，也要尊重人的生活

《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以下简称《千山万水》）邀请了13位文化遗产专家共同撰写，包括一线申遗撰稿人、申遗团队专家、遗产地管理者……他们大多亲历了申遗过程，为读者讲述申遗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从最初的申遗筹备，到保护工作中的不懈努力，书中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坚定决心和卓越成就，也体现了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书封。



陈凯/摄

出版社供图 庐山牯岭镇。

郑楚晗是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团队核心成员，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

北京中轴线从2012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到2024年正式申遗成功，历时12年。郑楚晗自2017年人职便参与其中，见证了中轴线申遗的关键阶段。

她提到，随着世界遗产申报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对申遗文本的要求越来越高。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材料经由多次国际、国内专家研讨会的讨论，以及多项专题研究支持的修订，愈发厚重与完善，充分体现了对遗产价值的深入挖掘与阐释。

北京中轴线的价值独特而深远——它不仅是《考工记》所载传统都城理想规划范式的完美体现，更是“中”“和”文明传统的重要载体。郑楚晗说，中轴线并非简单的建筑集合，而是从元代到明清，再到近现代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典范。中轴线申报的核心是城市规划思想，而15个遗产点是其价值的物质载体。

为什么要环境整治？郑楚晗提到，以中轴线为例，环境整治是为了让“城市规划思想能被感知”。“如果满眼都是杂乱建筑，就很难体会到历史风貌，所以才有了‘第五立面整治’（屋顶风貌改造）。”

每到冬雪飘落时，网上很多人会说“北京一下雪就变北平”。郑楚晗表示，因为登高（比如钟鼓楼）看屋顶时，现代建筑被雪盖住，能看到历史居住区的平顶风貌。“整治时，我们要平衡‘保护’和‘居民需求’——比如养鸽子，

不能说‘申遗了就不让养’，但鸽舍架在屋顶上，要设计得‘不扎眼’。”因此，整治团队走访了很多有鸽舍的居民，了解他们的需求后，重新设计、建设鸽舍，既尊重居民养鸽子的权利，又维护屋顶风貌。

“这就是活态遗产保护的难点：既要保护文化，也要尊重人的生活。”郑楚晗说。

世界遗产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世界遗产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吕舟在书中写道。

在《千山万水》新书分享会现场，庐山国家公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管理规划项目负责人陈凯分享了庐山申遗的故事。

陈凯说，1996年，庐山以中国第一个“文化景观”的身份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起初，庐山申报的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1996年世界遗产大会敲定时，没给庐山自然遗产身份，大家很失落。但是想到庐山成为‘中国第一个文化景观’，大家又兴奋起来。”

陈凯提到，“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及“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动的多样性”。

“文化景观”，凸显了庐山人与自然共生的特质。东林寺作为净土宗祖庭，见证了佛教文化的传承；白鹿洞书院则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源地，朱熹在此讲学，影响深远。此外，庐山的自然景观同样令人陶醉，五老峰的雄伟、鄱阳湖的壮阔，以及变幻莫测的云雾，构成了

庐山独特的魅力。

如今，中国已经有包括庐山、五台山、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内的6处“文化景观”类世界文化遗产。

陈凯表示，作为国内第一处被列为“文化景观”类世界文化遗产的庐山，“让中国人对自然山水审美、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理想空间的营造最先以一座高山的形态展现在世界面前”。

陈凯提到，庐山符合世界遗产的多项标准，其不仅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交融，还承载着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山水诗词文化的传承。如今，庐山依然保留着独特的生活气息，山上的牯岭镇，居民生活与自然和谐共生，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

“庐山案例也为我国后来的申遗团队在遗产类型的认知、价值标准的阐释等方面提供了全新的思路。”陈凯说。

中华文明的基因，一直在遗产中“活着”

吕舟在《千山万水》中提到，关于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共设有10条。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需至少10条标准中的一条，并满足真实性、完整性和良好保护状况这3个基本要求。

吕舟指出：“真实性要求遗产为历史遗存的原貌，而非现代复制品；完整性则涵盖遗产价值的全面体现，历史演变过程的完整记录，以及遗产范围的广度足以抵御外界负面影响；良好保护状况

则是遗产持续存在并发挥其价值的必要条件。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世界遗产评选的基石。”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周新华在书中指出，大运河和万里长城一样，都属于“线性文化遗产”——这是世界遗产中的一个特殊形式，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大运河世界遗产的保护，涉及范围广，其实已不仅仅是管理部门的职责，它也需要沿线民众的积极参与。”

周新华表示：“所谓的大运河文化，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河渠、相关的历史遗迹，也应该包括由大运河而生发的烟火气。对于大运河的保护，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继续流淌下去，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只是成为博物馆里陈放的展板图片。”对于我们普通来说，去了解、不遗忘，就是参与大运河文化保护的最好方式。

“多年来从殷墟甲骨灼烧的裂纹，到景迈山茶林蒸腾的晨雾，中华文明的基因，一直在遗产中‘活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唐际仁认为，《千山万水》这本书记录了中国人热爱遗产、尊重遗产、保护遗产和应用遗产的过程。“中国遗产不只是‘曾经的辉煌’，更是照耀世界的‘文明坐标’。”

建筑奇迹、宗教艺术、水利工程、江南园林、千年古城、绝壁崖画、多元海岛、高原茶山……这些“活着”的遗产，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智慧，也书写着人类文明的新故事。

□ 任冠青

谈到去图书馆，不少人都经历过“想学而不得”的无奈时刻：原本收拾好电脑、笔记本、水杯等装备整装待发，准备来一场“沉浸式自习”。好不容易到了图书馆，举目四望却没有空座，于是只得乘兴而来、悻悻而归。

图书馆“一座难求”，往往不是因为真的全程满座，而是由于不当占座的情况过多：几支笔、一堆书本资料，甚至电脑、平板等贵重电子物品，咖啡、奶茶、水果、零食等，都成了花式占座“利器”。有读者吐槽：有人早早占了座之后，就不见了踪影，“座位就这样被浪费了一天”。一边是找不到座位的读者，一边是“不知道人什么时候离开，会什么时候回来”的占座者——不当占座导致的坐席空转，显然不符合公共图书馆公平、开放、共享的原则。

近日，多地图书馆开始推出精细化管理举措，尝试提高坐席利用率。比如，首都博物馆制定《首都图书馆阅览席使用规则（试行）》，明确一人一座、先到先得，离座超过60分钟，将被视为自动弃座；深圳图书馆推行红绿提示单制度，非饭桌离座超30分钟贴绿单、饭点超60分钟贴红单；杭州萧山图书馆则采用沙漏计时，读者可以申请30分钟倒计时装置，时间一到即可可用。

这些更加“可视”的管理举措，本质上是在用制度化方式解决读者最真实的占座困扰，以馆方的适时在场和公正介入，清晰划定图书馆的使用边界。更为明确的规则引导，也是在提醒“任性占座者”们学会换位思考，以文明、共享的方式使用公共资源。

近些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逐渐完善，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家，阅览室席数176.6万个。与此同时，公众对图书馆资源的使用需求也愈发旺盛和多元。一方面，不论平日还是节假日，越来越多人喜欢去图书馆阅读“充电”。《2024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就显示，2024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达13.4亿。另一方面，去图书馆的人群逐渐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借阅读者，还有不少是考研、考公、考证的备考一族，移动办公人群，主要阅读绘本和有声读物的亲子群体，以及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显然，公共图书馆已从单一的阅览空间，变为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文化场域。

在此背景下，要解决图书馆“一座难求”的问题，满足读者的多元需求，除了要规范秩序，充分激活“占而不用”的沉睡坐席，也有必要探索更加实用的功能分区，有序安排不同群体的实际需要。

比如，对大学生、教师、科研人员等群体，可以设置专门的学术功能区，满足其就近借阅专业书目、古籍文献、学术期刊等需求。相较而言，“自带资料”的备考族和灵活办公者则没有那么高的借阅需求，“有座位”“环境安静”才是他们更加在意的。对这类人群，可以参照一些图书馆的做法，开辟专门的自习空间，在尊重人际边界的情况下尽量增加坐席数量，并通过增设隔板的方式保障私密性。

再如，一些市民、游客的入馆心态以休闲、消遣为主，很多人也没有座位需求，只要有地方能歇歇脚、轻松翻阅报刊书籍即可。对此，不妨打造专门的报刊阅览室，或在大众读物附近增设休闲座椅等，营造更加轻松舒适的阅览空间。

除了完善功能分区，借助技术手段和物流体系，推动借阅渠道从线下扩展至线上，也是提升图书馆服务效能的有益思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一些读者虽有借阅需求，却因距离、时间等因素，不便线下借阅和归还。对此，首都图书馆就推出了“网借服务平台”，提供“送书上门”和“送书到分馆”两种借书方式，为北京全市读者提供图书快递服务。类似举措，有助于打破公共文化服务的时空局限，服务更多读者群体。

当然，对于民众日益增长的自习和借阅需求，不能只靠公共图书馆去消化和解决。推动社区阅览室常态化开放，在政务服务大厅开辟“读书角”、自习区和移动办公区，加强对实体书店的政策支持，都有利于安放人们的多元需求，不再受到“一座难求”“无处自习”等困扰。

《吴石传》如何拨开历史迷雾

人们试图透过70余年的时空迷雾去理解吴石将军时，会发现每一个确定的结论都会引出新的疑问，每一个清晰的轮廓都藏着难以言说的模糊，而这是《吴石传》的价值和魅力：

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揭示了吴石将军复杂而立体的一生，让人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英雄形象。

《吴石传》通过大量细节展现了历史叙事的困境：档案的残缺、记忆的偏差、当事人的逝去，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完整还原历史真相几乎成为不可能。

荷兰历史学家安克施密特所言：“历史叙事本质上是对过去的‘隐喻’，而非对过去的全面‘复制’。”《吴石传》正是通过这种隐喻式的历史叙事，让读者得以窥见那段隐秘历史

的某些本质特征。

1949年8月，吴石将军选择前往台湾的那一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走向危险。书中描写这一抉择时，没有赋予他全知全能的英雄神话，而是展现了一个坚守家国情怀的军人在人生关键节点的审慎与决断。“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吴石将军的这番话透露出一种深刻的自省意识，这种自省不是事后的矫饰，而是驱动他作出危险选择的内心动力。

在个人安全与历史责任之间，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选择从来不是单向的。吴石将军选择去台湾的同时，也选择了让家人与自己共同承担风险。

《吴石传》没有回避这种选择带来的伦理困境：为了崇高的目标，是否可以让无辜的家人承担责任？书中通过对吴石将军子女后来生活的细致描写，将这一道德难题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叙事的勇气使得《吴石传》超越了简单的英雄赞歌，进入了更为深刻的人性探索领域。

吴石将军的故事最动人心魄之处，在于他对忠诚的独特理解与坚毅实践。

在国民党阵营中他身居高位，而同时他又在为另一个理想服务，这种双重性很容易被简化为“卧底”叙事。但《吴石传》揭示了主人公更为复杂的心理现实。书中通过对吴石将军诗词、书信和友人回忆的细密梳理，集中展现了他内心世界的矛盾与痛苦。吴石将军的忠诚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一种基于民族大义的更高层次的忠诚。

在就义诗中，他写道“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这里的“丹心”指向的不是某个具体政党或领袖，而是他心中的那个“我翁”——既可能是指民族先贤，也可能指的是内心的道德律令。吴石将军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被遗忘”状态，这种遗忘不是偶然的。《吴石传》的写作本身，就是对这种遗忘的一种抵抗，该书对那段往事的发掘和书写，不仅是为了弘扬历史正义，更是为了探讨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

《吴石传》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诗化的语言与充满哲理的思考。在面对那段充满伤痛的历史时，作者没有选择激昂的控诉或简单的颂扬，而是采用了一种诗意的沉思姿态。

书中对吴石将军家乡的描写：“闽江畔的青砖黛瓦、幽深庭院，以及少年吴石在琅琅书声中立下的救国壮志……”这些诗化表达不是对历史严肃性的削弱，而是对历史多维度的丰富。事实是历史的骨架，而诗意则赋予历史以血肉与灵魂。

吴石将军的生命轨迹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军人，从国民党高官到隐蔽战线工作者，在这一系列身份转换中，什么是始终保持不变的内核？《吴石传》告诉我们，是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对内心道德的坚持。

吴石将军的故事之所以今天依然打动我们，正是因为它触及一个永恒的问题：个体应当如何在与时代的关系中安顿自己的生命？是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上？是明哲保身，还是舍生取义？《吴石传》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它通过对一个具体生命历程的细致呈现，为读者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丰富素材。

(作者系哈尔滨知名文史学者、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 刘金祥

台北马场町的枪声虽然远去，但历史的回响仿佛还在耳边。吴石将军——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岁月的波纹中不断扩展着他的意义。

党史学者郑立撰写的《吴石传》，不仅仅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一面映照历史复杂性和人性深度的镜子。当

□ 韩浩月

一起看话剧或电影，有朋友直言不讳，明明这作品比较一般，为何你看得如此投入？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作为一名写评论的人，要理性、深沉、不动声色才好，如果被一部比较浅薄的作品逗笑或者逗哭，有损评论家的严肃本色。在偏见里，评论家的错是这样的，不苟言笑，吹毛求疵，让人望而生畏。

可惜我做不了这样的评论家。我对朋友说，在观看一部文艺作品时，我是观众，一名投票入场的，带有好奇心、渴望被满足的观众。我必须是一名观众，才能同场的其他观众，一道体验这场由艺术家们共创的演出。如果从进门那一刻起，就摆出一副评论家的面孔，带着挑剔的眼神和昂扬的、战斗的心，那我不是来看演出的，是来专门挑刺的，是给自己找不痛快的，何苦哉！

演出结束后，对于刚看完的作品，如果有人问我感受，我的反应也是温和的，因为我还处在从作品氛围里往外挣扎

□ 练笔记

“杀死”那个评论家

的过程中。如果我不假思索地马上评价，我是会犹豫的。因为我不知道立刻就下的结论是否准确，有没有经过思考过滤的观点，会不会对创作者造成伤害？如果可以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把感受写出来，或者告诉我，评论的文字会发表在报刊上，那么此时就可以用动写评论的思维和审美，努力把自己的真实观感准确地表达出来。

在观看的时候，作为一名观众，要把自己全身心都交给作品，交给舞台上或者银幕上的那些人，让那些角色带着你进行一趟冒险的旅程。毕竟你不能在观看的中途遇到不喜欢的场景或者情节，就愤然站起身来，大声说“怎么回事”。你还是要努力去尝试体会创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尝试去与创作者共鸣，哪怕是失败了，也要

带着评论家的眼光和思维去看文艺作品，往往会招致尴尬。在观看时，只管感受和记录就好。遇到不喜欢甚至令人气愤的作品，等到写评论时再去“报复”。

未经思考与审视过程产生的评论，容易招来罪责与报复，这点在中外文艺界都是普遍现象。记得在看电影《云图》时，一个情节让我哑然失笑：一家出版公司的签约作家，在酒会上把一位对他新作冷嘲热讽的评论家扔下楼梯摔死了。这个情节让我知道，作家与批评家，有时候是一对死敌，作家可能对表扬他们的评论家无动于衷，却会对批评他们的评论家恨之入骨，虽然不至于一见面就拔拳张口，但作家想要“杀死”批评家的心理却是客观的存在。

作为同时是作家也是评论家的毛姆，

十分讨厌一些评论家本人与作品的评论家，他在小说和随笔中时常毒舌那些评论家。比如在《寻欢作乐》中，毛姆借书中人物之口，讽刺评论家是“拿着放大镜找茬的秃鹫”；在《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中，他说“评论家们用道德标尺丈量艺术，却用放荡的尺度评判生活”；在《月亮与六便士》里，他称评论家如同“戴着白手套的刽子手”……但作为评论家的他，仿佛忘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在批评别的作家时，比绝大多数评论家都狠，比如他说巴尔扎克是“高利贷者文学代言人”，狄更斯的《双城记》是“报纸连载催生的流水线产品”，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是“精神病人的呓语日记”……

讲了这么多关于评论家的自我定位与认知，以及如何看待评论家的问题，是想

表达两个观点：一是如果你是评论家，那么要学会阶段性地否定自己，通过怀疑自己而实现平等客观公正看待他人的目标；二是如果你是作家或者其他文艺作品的原创作者，在对评论家咬牙切齿的同时，也要尝试换位思考，用评论家的立场来审视自己的作品，态度越严厉越好，最好是先于评论家之前“杀死”自己。这样即便后来评论家如何批判你的作品，都不会激起他半点内心的波澜，因为他们批评过的，都远不及你的自我批评与反思。

文艺作品是需要评论家的，很多时候评论家是可爱的，有时候评论家是可恶的，他们可以用专业读者的身份，帮助创作者发现作品未被重视与发掘出来的价值，用多元视角来帮助作品